

蒋介石 1950 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陈红民 傅 敏

内容提要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此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 1950 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关键词 蒋介石 “复职” 李宗仁 美国 策略

1950 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透过对此事件的研究,既可以了解 1950 年初期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近年来学界关于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与“复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下野方面。如对蒋介石下野原因的剖析,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此次下野既有“近因”,亦有“远因”,战场上的失败为其“近因”,而专制独裁、经济危机、派系矛盾等为其“远因”。^①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此次下野是美国暗中“换马”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促成。^②亦有人提出相反论点,认为蒋介石的“下野”不是美国干涉的结果,而恰恰是美国采取从中国“脱身”政策的反映。^③也有一些论文研究蒋介石下野后的活动。^④如有研究着重描述蒋介石下野后在幕后如

何继续操纵政局,阻挠李宗仁“代总统”职权的有效行使,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对李的掣肘。^⑤有研究探讨蒋介石阻碍国共两党的“北平和谈”。^⑥但也有学者依据“蒋介石日记”研究,认为蒋对李宗仁“代总统”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在 1949 年 4 月“北平和谈”结束时,蒋对李基本上配合,甚至李在会议中提出要蒋“复出”时,蒋介石“坚决拒绝,并明言不能再提此事”^⑦。台湾学者在 2009 年出版了两部关于 1949 年国民党政权撤台历史的研究著作,林桶法的《大撤退:蒋介石暨政府人民迁台经过之探析》(辅仁大学出版社)与刘维开的《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台湾时英出版社),两书均设专章讨论蒋介石 1950 年初在台“复职”问题,其中均运用了“蒋介石日记”等最新史料,弥补了以往研究叙述过多,学理性不足之缺陷。

然而,蒋介石“复职”是一个较大的课题,仍

* 本文初稿曾于 2009 年 8 月在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召开的“重新评估蒋介石:国际对话”(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上宣读,承评论人邱燕凌(Emily Hill)教授及叶文心(Wen-hsin Yeh)、段瑞聪教授等提供意见,谨致谢忱。

有研究空间。他为何1950年初要在台湾“复职”，又采取了何种策略战胜对手，顺利“复职”？本文拟根据“蒋介石日记”与“邱昌渭往来函电选”等史料对蒋介石的“复职”事件进行梳理，侧重研究蒋介石个人的心路历程与策略运用，以期抛砖引玉，丰富相关课题的研究。

大陆时期蒋介石李宗仁围绕“复职”的较量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大规模溃败的局面没有改观，反而有加剧之势，“代总统”李宗仁无力控制局势。4月底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南逃广州。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亲信的怂恿下，开始考虑取李宗仁而代之的计划。

1949年10月8日，“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密电蒋介石，“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致电蒋介石：“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⑧9日，吴忠信到台湾见蒋介石前，专门拜访李宗仁，问其“有无知难而退之意”^⑨。CC系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则已直呼蒋介石为“总统”，台北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川康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人纷纷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希望李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的“劝进”。10月18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其“复职”问题，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委员的支持。当蒋就此向丁惟汾、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征询意见时，却遭到了质疑。元老们认为，蒋介石宣布“引退”是依据“宪法”而行的，除非李宗仁诚心求退，否则，“蒋不宜径自宣布复职”。吴稚晖更对蒋直言，“万不可使李宗仁脱卸其政治上应负之责任”^⑩。蒋介石也认为“李宗仁之求退，并非心愿诚服，亦仅知难而退，想脱却沉重包袱而已”^⑪。他此时不想负国民党失败的领导责任，决定暂缓“复职”，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幕后操纵全局。

1949年10月，李宗仁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逃至重庆，其所依仗的桂系势力逐步瓦解。蒋介石走上前台，加快“复职”步伐。李宗仁虽无力控

制局面，但他将所有原因均归结为蒋对自己的掣肘，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蒋欺人太甚。起初，我并不想上台，是蒋强迫我做代总统的；在我到职后，他把库存金银外汇和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台湾，并且先后破坏守江计划和保卫广东的军事。等到局面搞垮了，他又要出来了。好像我的进退完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⑫当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当面劝李宗仁退位时，李斩钉截铁地回绝：“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揆诸史实，当初李与桂系逼蒋下野何其急切，其后又千方百计不肯让位，李宗仁“我并不想上台，是蒋强迫我做代总统的”表白有些矫情，但他对蒋的愤怒与坚决不退之决心确是表露无遗。

此时，李宗仁得以与蒋对抗的关键武器是1947年的“宪法”。依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总统”缺位由“副总统”继任，如再缺位，则由“行政院长”继任。这就意味着，他如不主动退职，蒋就不可能顺利复职。李宗仁以此为仰仗，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1949年11月初，蒋介石准备赴重庆，并约李宗仁面商。李预判蒋介石此次来渝定是要“运用各种手段强迫他签署‘劝进书’”，便赶在蒋抵重庆前，于3日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飞往昆明。11日，又自昆明飞往桂林，后转飞海口、南宁。最后于20日飞赴香港，准备经香港去美就医。李的这趟“出巡”，就是不与蒋介石见面，使其在重庆有“扑空”之感。不仅如此，李宗仁还在赴港前发表了书面谈话，详细安排自己离渝后的“中枢军政事宜”。谈话称：

余此次出巡西南各省，意在视察各地军政情形，原拟行程完毕，即行递返中枢。惟自海口返南宁后，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因决于本日赴港，转美检验，从速施用手术，否则对于身体健康，可能发生极严重之影响。目前局势严重，不敢自逸，余决以最经济之时间，致力于体力的恢复，俾今后得以全部精力与我军民共同战斗。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院长负

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⑬

李以“治病”为借口,远避美国,并巧妙地通过对自己出国后“国事”的安排,表明自己仍在控制局势,一则免遭“擅离职守”的谴责,二则堵塞蒋借机“复职”的可能性。

11月20日,李宗仁赴港当晚,蒋介石在重庆连夜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商讨李“突然出国问题”,决定派人挽留李宗仁。22日,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携蒋写有“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掌握”的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宗仁回重庆。李拒绝。27日,蒋再在重庆召集国民党中常会,针对李拒绝回渝,蒋介石在会上表示了考虑:

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心之作用。^⑭

蒋介石不说自己要“复职”,但强调“无政府”的危害,这使得与会者“一致拥蒋复职”。然而,会议的决议仍是两手准备,给李宗仁以机会,决议称:“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意即继续设法劝李回国执政,同时也做好蒋介石复任“总统”的准备。次日,蒋介石再派洪兰友、朱家骅携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飞赴香港,促李返驾。此为蒋第一次就“复职”问题公开向李摊牌。李宗仁不仅拒绝返渝,避开蒋的挑战,而且于12月5日以“代总统”的身份偕夫人离开香港,飞赴美国治病。临行前,李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此电表明李宗仁维护其“代总统”地位的决心,并试图联合阎锡山一起为蒋介石“复职”设置障碍。

可见,蒋介石“复职”问题的缘起,是国民党

政权面临的巨大困难。即使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是李宗仁所说因为蒋介石的掣肘(实际上,当时国民党的困局是其对手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造成的,无论是李还是蒋都不能阻挡),但他“代总统”近一年来无所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李宗仁以避而不见远赴美国的方式对抗蒋的挑战,设置障碍阻蒋“复职”,一度也让蒋无计可施。

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12月彻底逃到台湾。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权力之争亦进入新的阶段。

蒋介石“复职”

国民党政权在一片混乱中退据台湾,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军事进攻,仍有朝不保夕之虞。李宗仁滞美不归,蒋介石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全局,行政方面却有实无名,“政府无首”,更加剧了混乱局面。

蒋介石认为“复职”已不容再缓。他1950年1月中旬在日记中写道,值此“危急纷乱无政府之状态,以及美援绝望之际”,应“统一事权,集中力量以挽救危局于万一”。面对李宗仁之不退让,蒋介石曾考虑避开与李在“总统”问题上的纠缠,而以某种“军政府”的方式取得实权,抛弃李宗仁。如以“公推方式”由他来“主持军委会与出任反共救国军统帅,下置各部会替代政府,彻底改革军需与军政制度”,“惟有亲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而不复总统之位),以军法治理台湾为反共基地,澄清现局”。无法确定蒋是否考虑过军政府的详细运作,但其灵感似乎来自当年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在南方建立政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实践。但蒋同时又担心,如果真建立军政府,“此必为美国反蒋派藉口”;而且他如何能再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产生手续与方式,应加研究”。^⑮权衡利弊,蒋放弃了这一设想,确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逼李交出职位而自己“复职”。于是,蒋介石继续力促李返台“视事”。

蒋介石通过各种途径促李宗仁来台,有双重目的:一是如李宗仁果真来台,也只能束手就范,此时台湾的党、政、军、财大权已基本掌控在蒋手中,桂系主力已在大陆被解放军歼灭,逃到台湾的

白崇禧等人难成气候。^⑩二是如李不肯自投罗网返回台湾,则更可暴露李宗仁危难之际远避外国,不履行职责之“不义”,激起“公愤”,使其丧失民心,为蒋“复职”作“民意”的铺垫。

1950年1月,“监察院”致电在纽约的李宗仁,以委婉的口气指责他擅离职守,玩忽“代总统”的职责,并促请其立刻回台北“视事”。李宗仁回复电报中,拒绝赴台:

仁(李宗仁自称——引者)每念中央诸同志及各地将士之辛勤劳瘁,弥增愧疚。所幸在此留医期间,除施行手术之三数日外,对府院及各方所来函电均亲自批阅,府院命令照常公布,并未因仁之病而受丝毫影响。至于执行部分,系由行政院负责处理,故不特府务无废弛之虞,政务亦无中断之虞。目前国内局势,美援至为重要,仁在留医期间曾与美朝野直接间接密取联系,以冀有所补救。披沥奉告,诸希查照是幸。^⑪

李表白自己虽在美国,但仍恪尽职守,政务未受影响,而且强调目前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极为重要,其意终落在不放弃“代总统”一职,阻挠蒋介石“复职”。

李宗仁的回电未能平复台北方面的不满,反而火上浇油,舆论主调从“促李赴台”变成了“促李下台”,呼声更炽。2月3日,“国大联谊会”致电李宗仁,要求其明白表示,要么放弃“代总统”职位,要么立即回来:“当戡乱军事进入紧急之际,先生忽称病出国,时届两月,迟迟未归,对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未能重视,致中枢无主,举国惶惶,莫知所措。代表等迭电促返,迄未见复。复以先生竞选时之主张及就职时之誓词,殊多不合,违宪误国,咎将谁负。代表等受全国人民付托之重,目睹时艰,痛恨无似。特再电请明白示复,以明责任。”^⑫对此,李宗仁仍置之不理。

与李宗仁的斗争一度呈胶着相持之态,使蒋大为恼火,他在2月4日记道:

近日心神不宁,时现燥焦灼之象,对于各事观察往往过于险恶与紧张,若从容考虑,事实并不? (此处一字不能辨识——引者)如此之躁急忧虑,自取烦恼耳。此乃修养不足之故,以后对于宁静淡泊,主敬主极之道,当

特加意,切勿操之过急也。^⑬

然而,就在次日,蒋介石却下定“复职”的决心:“决心作复位之准备,以非此不能救国也。”决心既定,笃信宗教的蒋氏夫妇还在当天早上的祷告中,“对上帝之恳求语出肺腑,妻言更切,深信上帝必能监察而终不我弃也”^⑭。

是什么促使蒋介石做出最后的决定?循蒋的日记可以找到答案。他的基本判断是,以台湾风雨飘摇无人担当的局面,他再不出面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三月,其必为若辈自取灭亡矣”^⑮。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般的“民意”也基本站在他这一边。4日当天阎锡山面见蒋介石谈辞“行政院长”事,蒋认为阎的用意是“使宗仁能早觉悟其违宪失职,不能逃避其责任也”,已经与自己同一立场,故对阎的辞意表示“慰之,劝勿辞”。^⑯

蒋介石自认为拥有国民党内“民意”支持,大局抵定,便开始终日考虑“复职”及之后政策,他在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次复出主政,对于军政、经济、政策、人事、组织以及本党改造方案,皆未确定。恐难? (此处一字不能辨识——引者)过去功亏一篑之覆辙,或不如过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于此十日之内必须积极准备,对于下列各项必须切实研究,有所决定也:(1)政府组织方式,总体战军政府之精神出之;(2)干部会议纲领与人选;(3)总体战实施程序与经济政策之决定;(4)研究设计、监察制度与组织之实施;(5)党的改造方针之决定;(6)台湾党政方针与人选之决定。^⑰

蒋介石决心已定,就不再顾忌李宗仁的立场,而全力准备“复职”的各项工作。

2月14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委员联名致电李氏称:“现任行政院院长暨副院长已先后向中央常会递呈请辞,意至坚决,中枢现势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感。……同人等企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事虚悬,政府更不容长此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集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祈。

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迫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194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以维大局。”^④这是对李的最后通牒,如李再不回来,他们将请蒋介石“复职”。同日,“监察院”也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式函电,电文短劲严厉:

本院为团结救国,乃有寄电,同心之苦,人所共计谅。不期先生(指李宗仁——引者)于复电中反饰词自辩,稽诸宪法,总统职权决不能寄居国外,遥为处理,故尊电自总统府发表后,民情愤激,舆论哗然,事实俱在,当荷明察。先生如仍不体念当前局势之陆危,及前电之忠告,而不迅为明确之表示,则拖延贻误,无异自绝于国人。同仁实不能不肩负人民之付托,以克尽职责,惟不忍于此时再与先生作文电之往还也。谨此电达。^⑤

2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中常会举行第266次会议,居正、于右任等52人出席,会议专门讨论蒋介石“复职”问题,最后决定“请蒋总裁尊重各级民意机关暨全体军民与海外侨胞之公意,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早日复行视事,以挽危局”^⑥。次日,“立法院”又在“院长”刘健群的带头下,联合签名致电蒋介石,“敦请”其“复职视事”：“愚我公本救国救民之旨,尊重輿情,即日继续视事,行使总统职权,挽垂危之局势,竟戡乱之全功。”^⑦

“司法院长”王宠惠特地从香港赶到台北,为蒋介石“复职”提供法律依据。当蒋介石“请教”王宠惠是否适宜此时“复行视事”时,王的答复是:“此乃政治问题,而并未违宪也。”^⑧王宠惠还以其特殊的身份解释“宪法”第49条与蒋“复职”的关系:“总统复行视事,有宪法根据,蒋总统不能视事原因消失,李副总统行权当然解除。”王的谈话,为蒋介石提供了“法律保障”。

至此,国民党与国民党政权的高层人士几乎都站在蒋介石一边,公开吁请其“复职”,形成了“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局面。

2月下旬,蒋介石在台北宾馆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及军政要员四十余人开会,讨论“复职”问题。会上,蒋介石宣布定于3月1日上午正式“复职”,并通知“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做好准备工

作。他在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其今后变化如何,决于下月一日复位。”^⑨

1950年3月1日,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天。他在下野一年多之后再次“复职”。他当天的日记事甚详:

三时起床,修补致桂李电文,请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诸句再三考虑,以为无损于内容也。静默祷告至五时方毕,再睡也。七时复起,继续朝课,与妻跪祷自今日复位起,愿誓以一切奉献于上帝,此身非为自我所有矣,惟上帝垂察之。记事后,与少谷同到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举行仪式毕,乃回办公室摄影,在阳台上对府前群众答礼后,视察秘书长、参军长各室后乃离府,顺访稚老先生致敬。回寓批阅公文。自今日起,公文由周秘书口述而后指示要旨代批之,如此乃可省目力,而只用耳力,较易也。正午,约宴干部商谈就职后应办要事。下午午课如常。约见民、青两党代表后,修正明日对民意机关代表讲稿。入浴后晚课。^⑩

日记中透露的信息是,蒋介石“复职”当天的心情十分紧张,对如何处置在美国的李宗仁没有把握,凌晨3时即起床,修改致李的电稿。信仰基督的他罕见地一天四次祷告(包括早上与宋美龄的跪祷),求上帝保佑。当日上午10时,蒋介石到达“总统府”参加“复职”典礼,阎锡山、陈诚等文武百官参加。蒋介石在仪式上发表了“复行视事”文告。随后,至“总统府”办公室,召见“行政院长”阎锡山,询问有关事宜,批阅了邱昌渭呈递的几份文件,以示正式开始行使“总统”职权。台北方面为蒋的“复职”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蒋介石是如何看待自己“复职”效果的呢?他在3月底总结道:“复职已经一月……余之信誉不仅无所损,而且中外观感大转,全国民心之归向至月底益显。共匪虽凶,广西子虽诈毒,亦不能减损我毫发,而国家转危为安之机,则甚明也。……总统府、行政院各部改组已经完毕,今后军政财政皆有重要主持之人,当然政府加强显见重大改革与进步。一年余来无政府无责任之状态至此可告一结束矣。”^⑪显然是非常满意。

“美国牌”在蒋、李争斗中的运用

美国对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影响至深,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美国即为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失去大陆前后,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对华政策基本上从“介入”改为“袖手”,等待尘埃落定。但它在国民党内争中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

李宗仁抵达香港时,即嘱“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政府,告以赴美就医之意。美国方面并未立即同意,而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答复需向国务卿请求,李宗仁身边的人认为,这“等于碰了一个软钉子”^②。最后,李向美方“郑重表示”,“在美治疗完毕后即回国”。有了这样的保证,美国才允许其治病。^③蒋介石与杜鲁门政府结怨甚深,他认为美国同意李宗仁去,就是纵容支持李。他在日记中多次痛骂杜鲁门与艾奇逊的政策是:“以李宗仁为逼制我内政,使其分化瘫痪。……只要能达成毁蒋消灭国民政府之惟一目的,则无不可为之事。”^④而受蒋派遣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美龄屡屡受挫,于1950年1月返抵台湾。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不再军援台湾。其后,艾奇逊更讥讽蒋介石是“一离弃大陆逃避海岛之难民而已”^⑤,此举对蒋的打击不小。台湾方面曾决定派李品仙赴美国催促李宗仁回台,但申请签证时被美国拒绝,其理由是:“国务院相信一月以后,李代总统即可回国,李代总统亦保证疗养后即行返国。由于此种情形,李品仙将军去美促驾,似无必要,现美国国会及报界正对中国问题意见纷纷之时,李品仙将军之赴美尤为不宜。”“李品仙将军赴美实不能发生作用,反有不妥之处。”^⑥美国此时的立场,与其不过度卷入国民党内争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李宗仁借美国以自重,钳制蒋介石的“复职”进程。李宗仁以“正在”与美国各方接洽援助作为其在手术出院后仍滞留不回的重要理由。其实,李宗仁并未获得美国政府任何的承诺,甚至想接触美国高级官员都很难。知悉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备“复职”,李宗仁为借美国之力,竟谎称即将“回国”,行前求见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出于礼节,答应设便餐招待。李宗仁借此大事声张,以证

明美国支持其“代总统”地位,对蒋形成威慑。远在台北的蒋介石不明原由,果真十分紧张,对美国是既恨且惧,不禁大发感慨:“此乃其国务院又一倒蒋之阴谋也,以其恐其一日复位之消息实现,而又望余展期则其以拥李之手段达成毁蒋之目的。”^⑦然而,蒋的决心并未动摇,他一面紧张地关切美国动向,一面继续“复职”的各项准备。

李宗仁并未得到幻想中的美国支持,甚至在美国的国民党外交官与侨界对李宗仁也多保持距离,他在与杜鲁门见面后离开华盛顿时,仅“驻美大使”顾维钧一人到车站送行,“华侨界、大使馆或其他政府机构均无人到场”,场面凄惨。^⑧李宗仁曾请孔祥熙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在以“代总统”身份访问过杜鲁门后,主动宣布辞去“代总统”一职,体面地下台。然而,蒋介石并不信任他,认为这是一种拖延战术:“希求转圜而实则希图拖延时间而已”,未予理睬。^⑨无奈而恼怒的李宗仁便在美国公开制造反蒋舆论。1950年2月27日,李的秘书甘介侯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蒋介石的“复职”活动专横跋扈,是“非法的”和“违宪的”。甘介侯称,蒋介石放弃“总统”职位而让位给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后,已成为一个平民,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总统”?^⑩

李宗仁的激烈反对,蒋介石并不在乎,真正让他介怀的是美国对其“复职”的态度。“复职”仪式一结束,蒋即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通知美国,他已经恢复“总统”职务,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希望美国政府能予以承认。同时,要叶公超尽快探听李宗仁与杜鲁门会晤的内容和接待的规格,特别是急于了解杜鲁门在接见李宗仁时,是否仍称他为“代总统”。美国方面传来的消息让蒋满意。美国国务院3月2日下午宣布,“美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的问题”。国务院还特意说明,杜鲁门与李宗仁的会晤纯属社交性质,来宾名单也只称其为“李将军”。

美国政府的“袖手政策”,使得“美国牌”的影响在此次政争中只局限在心理上,并未实际上起作用。蒋、李之争主要取决于其在国民党内的力量。

蒋介石何以顺利“复职”

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充满着曲折,最终能顺利“复职”,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与李宗仁在政争中采取的不同策略,直接影响了最终结果。以下着重就双方所用的策略进行分析。

(一) 蒋介石的决心与策略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多次以退为进、“下野”再“复职”的经历。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保持对国民党的领导和责任,从其当时的日记看,他几乎每天都在考虑“党国大计”。在战局不断受挫的情况下,蒋很快就从后台又走上前台,如他到上海及西南直接部署军队作战,设计撤退台湾等。到台湾后,他着手组建“总裁办公室”,“下设八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俨然新的权力中心。^①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培养各类干部,已经基本控制了大局。他1950年初的“复职”,可以说是其对权力追求与对国民党政权的“使命感”共同促成的,个人利益长期与国民党政权的共存共荣关系,使他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之际,不能不挺身而出。他在“决心作复位之准备”时写道,“非此不能救国也”^②。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是达成目标的必要条件。

在具体策略方面。首先,蒋介石步步为营,以“民意”逼李。1949年11月底李宗仁赴香港后的国民党中常会“一致拥蒋复职”,开启了蒋“复职”之门,蒋在与李宗仁的争斗中逐渐占得主动。开始蒋并未强弓硬拉,立即上位,而是相机行事,运用策略,逼李就范。蒋的策略之一是抓住李不肯回来的弱点,始终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关(国民党中常会、非常会议,“监察院”、“立法院”、“国民大会”等)“敦促”李回国履行职责,强化了李在危难时刻擅离职守、逃避责任的形象。而蒋本人在国民党中常会支持“复职”的情况下,仍不断“示弱”,表示只要李肯回国主持,自己全力支持。如此,使“民意”彻底倒向己方。军事溃败与撤退台湾后的混乱局面,也使国民党上下希望蒋介石“出山”主政,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利用公众心理,打“民意牌”的策略,获得成功。

其次,分化对手。政治斗争毕竟是实力的较

量,蒋介石十分注意瓦解对方。桂系是李宗仁赖以立足的基础,白崇禧是桂系二号人物,曾与李宗仁患难与共数十年,被合称为“李白”。蒋介石利用此际李、白对时局处置的分歧,加紧拉拢白崇禧^③,使白逐渐转向。李宗仁飞赴香港前,白崇禧劝其出国之前应“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暗示其将“总统”职位交还蒋介石,被李拒绝。12月30日,白崇禧到达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逐渐沦为蒋的工具。为配合蒋介石“复职”的步伐,白崇禧1950年1月率桂系的李品仙、刘士毅、邱昌渭等人致电李宗仁,劝其“为留将来旋回余地,现在不妨暂退一步”。建议李以在美继续养病为由,“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致电中央”,同时针对李坚持依“宪法”行事的观点,提出“国家存亡,间不容发,为大局计,法理事实似应兼顾”^④。此电报表明,白崇禧在“复职”问题上完全站在了蒋一边。3月1日“复职”当天,蒋介石还专门邀宴白崇禧等桂系将领,以示安抚。白崇禧等人对李宗仁此时的不敢担当多所不齿,且基于现实,为求自保,也只能满足于蒋介石有面无心的恩惠,配合其“复职”。蒋介石内心里对桂系将领仇恨万分,戒备至深,疑其在台北的活动是与李宗仁里应外合。蒋在1月底的日记里更以“奸”来称谓白崇禧,表示必欲除之:“白崇禧又在台北作无耻无赖之宣传煽惑,希图作最后之毁蒋运动,对此应有以制之。此奸不去,姜笋混淆,无以复兴。”^⑤3月1日蒋宴请白等之后的日记中记道:“彼(白崇禧等——引者)虽表示必诚实,实不能令我有所动也,其害国害民之大,无法取信也。”^⑥但他利用桂系将领特殊身份反对李宗仁的策略可谓相当成功。蒋介石“复职”后,李宗仁在美国有激烈反应,称蒋“违宪”,他还是“中华民国总统”,即将返国行使职权。对此,白崇禧等人又以“风雨同舟,久共患难”的身份发表通电,指出“钧座(指李宗仁——引者)一方申言维护宪法,但同时又与宪制下所有民意机关多数人之意见背道而驰;钧座笃信民主政治,而近日言行只惑于左右一二人之主张,置昔日多数袍泽与国内普遍舆论于不顾。……钧座今日所为,既无章法,又鲜风度,一意孤行,至于此极”。要求李“悬崖勒马,支持政府,增

强力量,共挽危亡”。^{④7}

再次,争取中间力量。对阎锡山辞职的处理,也显示出蒋的手段。“行政院长”阎锡山没有主动卷入蒋、李之争,夹在两人中间,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蒋对其也颇不满,“伯川(阎锡山字——引者)推诿卸责,关于政府瘫痪现状,皆欲归之于余”^{④8}。1950年2月初,阎锡山表达辞职之意,蒋认为此举可突显李宗仁造成政治混沌局面,“不能逃避其责任也”。另外,按李宗仁对“宪法”的解释,即使他辞去“代总统”,继任者也该是他任命的“行政院长”阎锡山,而非蒋介石。但阎辞职后,新“行政院长”将与李无关系。这些,都有利于蒋的“复职”进程。蒋介石便想借此为“解决总统复位问题之途径”,于是,立即召集蒋经国等人商议对阎辞职的“善意之运用”^{④9}。不料,阎锡山后来却表示,他要循正常程序向“代总统”李宗仁辞职。这使蒋大为恼火。因为如阎向李提辞职,则等于给李宗仁一个行使“总统”职权的机会,李大有文章可做,“使问题更为拖延复杂而不能解决”^{⑤0}。蒋在日记中骂阎,“其旧性仍未改变也。往日所谓共患难之言何在?”他多次当面劝阎锡山不得向李辞职,并让人转告阎“辞职不可轻率”,须蒋亲自批准方可。^{⑤1}最后,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不给李任何借用,再由中常会转而借此事向李宗仁施压,要李限期回台。如此,蒋介石不但化解了不利因素,反而借力打人,一箭双雕,既达到以阎辞职加重李逃避责任的社会观感,又借此事制造逼李返台的舆论。

此外,针对李宗仁一再以“宪法”阻止其“复职”,蒋介石也以“法理”一一回击或化解。如让监察院来“弹劾”李宗仁失职,“国民大会”代表联署“呼请”蒋“复职”,由“司法院长”出面解释其“复职”并不“违宪”等。

(二)李宗仁应对失据

作为对手,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的实力本就不如蒋介石,出任“代总统”后又没能挽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当其职位受到蒋的挑战时,他只有占着“代总统”位置这一点优势。而他在应对策略上明显不如蒋介石,导致最终落败。

首先,李宗仁不能面对蒋的挑战,选择了逃

避。李宗仁意识到蒋介石将逼其交出“代总统”宝座时,不是勇敢面对,与其谈判,而是选择避而不见的策略。先是离开重庆去各处“巡视”,最后去美国治病。这确实让蒋介石计划落空,有如“隔山打牛”。但李宗仁离开的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最危难的时刻,身为最高领导却远走他乡,等于将“逃避责任”、“擅离职守”等罪责揽于己身,不待对方攻击而自暴其短。李宗仁虽然以政务已有所交代不致荒废、在美国交涉等理由来开脱,但在当时危机局面之下,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其最重要的职责应该是“坐镇中枢”指挥。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的离开,也意味着他脱离了与蒋介石争斗的主战场,完全陷于被动,任蒋操纵安排而自己无计可施。李宗仁是久经沙场的军人,但在政争对手进攻之时,早早放弃了阵地。

其次,李宗仁阻止蒋最重要的武器是“宪法”。“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出缺”时的继任者顺序:“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总统、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并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其任期以补选原任总统未满之任期为止。”李据此指出,蒋介石早在1949年1月即已辞去“总统”,若强行“复职”便是“违宪”。李的坚持确实给蒋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李宗仁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近代中国,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是强权者手中的面团,可以随意塑造。蒋介石“复职”前,通过“司法院长”王宠惠出面“释法”,提出当初蒋介石辞职依据的是“宪法”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其下野文告内所谓“身先引退”,系指“退身一旁,看看将来怎样”,以冀弭战销兵,促成和谈。今和谈失败,引退之目的未达,“不能视事之原因亦已不复存在,蒋总统自得发表文告,重行视事。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亦自因此当然解除”。^{⑤2}蒋介石下野之时,已为“复职”预留伏笔,韬略是李宗仁所望尘莫及的。

再次,李宗仁试图寻找美国支持。李宗仁所以选择去美国治病,是希望能在美国获得支持,加重自己的砝码。在打“美国牌”方面,李宗仁身在美国而占得上风,这也确实让蒋介石感到头疼。

可惜,杜鲁门政府虽一度对蒋介石不满,此时却不愿太深地卷入中国事务,故李宗仁在美的活动几无成效,其所谓“仁留美期间,曾与美朝野直接间接密切联系”的模糊说法,只是他滞美不归的托词。李宗仁打“美国牌”最成功的“公关”是约到与杜鲁门总统见面的机会。然而,时间上太晚,李与杜鲁门见面是在3月2日,而蒋在前一天已经宣布“复职视事”。李虽事先也大事声张,但蒋决心已定,“决置之不理”。对此事件,蒋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杜鲁门约其(指李宗仁——引者)二日午餐,是其派甘侯(原文如此,指甘介侯——引者)向白宫多方运动不成,乃设计骗局假称李即回国求见,使杜不能不以其代总统之礼饯别。不料其为见杜以张大其对国内之声势,作其政治资本而妄想阻止我复位,殊为可耻。此一骗饭之丑,不啻丧失我国体,貽笑中外,而且遗臭万年矣。”^⑤李宗仁的“美国牌”确实让蒋虚惊一场,但没有收到实际效果。

李宗仁囿于个人利益,始终不肯放弃权力,导致进退失据,不仅被对手攻击,桂系旧友也多有怨言。白崇禧等人在蒋、李政争中的表现,固然与蒋的拉拢有关,但也未尝不是他们对李的作为不满所致。邱昌渭的转变最具代表性。邱是李宗仁任命的“总统府秘书长”,李对其十分倚重,政争时曾以已将“总统府”日常事务委托邱处理,来回应对其离开致使“政务荒弛”的批评。但蒋、李政争开始后,邱对李之不满益增。1949年11月,李宗仁因蒋到重庆而远避不见,邱昌渭等人便有微词:“德公(指李宗仁——引者)身为元首,久出不返,在客观方面有藉出巡以逃避责任之嫌,此不独失去国人同情,且甚足以影响将来在政治上之领导。”^⑥几天后,他在电报中借转述“一般人”的观感,将自己的意见直接告诉了李宗仁:“因在一般人看来,今蒋公为促进团结,协助钧座而来,而钧座反巡视不归,致误认我不愿团结。且首都危殆,人心浮动,谣言繁兴,民心士气需要钧座在此鼓励者更为迫切,倘仍不速来,似乎轻重倒置,对于钧座损失太大,凡此批评,两日以来耳闻甚多。职等忝长僚幕,不敢缄默,钧驾应否即返,迅乞睿夺赐复为祷。”^⑦邱因主张并未被李宗仁接受而相当失

望,在致白崇禧的电报中明白表示:“昌渭盼蒋先生早日复职,俾自己得早日解除职务,从此后不愿过问政治矣。”^⑧邱昌渭在1949年11月底给其夫人的信中,对李宗仁与蒋介石的表现进行了一番比较:

重庆算是丢了,蒋先生于今晨六时离白市驿,据说离敌人只有二十余华里。他这次顶到最后,这种精神博得军民上下之拥护与爱戴,因此把李先生相形愈下了。李先生出巡即一去不返,对军民上下没有交待,住在香港养病,既无章法又无风度,过去对李抱同情与拥护者,今皆反其道而对蒋有好感矣。我不赞成李先生于此时住在香港讲价钱。……李先生所用之人,不是贪污,便是无能,将来怎能再来领导政治。^⑨

这就是李宗仁最亲信的人在1949年底对蒋、李之争的基本看法,连邱昌渭都盼蒋介石“早日复职”,李宗仁可谓人心尽失,几乎是孤家寡人,无人相助,如何与蒋介石对抗?^⑩

简短的结语

纵观蒋介石第三次“复职”的过程,身处劣势的李宗仁试图以“宪法”规定阻止蒋介石,以就医为名避居海外,但他的拖延之策终归无效。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基于个人对国民党控制的责任感,希望通过“复职”来收拾混乱局面。拥有实力的蒋介石利用“民意”,将李置于受谴责抨击的地位,分化桂系势力,统合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顺利“复职”。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危局,使得党内高层人士在蒋、李政争中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而势单力孤的李宗仁无法取得内外支持,使得这场政争最终以蒋胜李败落幕。

1927年成为国民党政权主要领导人后,蒋介石有三次下野又三次复出的经历,他每次在危机中下野,却在复出后开出一片新局面。说明蒋对形势的判断与意志力确有过人之处。1950年后台湾局势的安定还主要得益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保护台湾和大规模的援助,但如果不是蒋介石“复职”,使混乱纷争的国民党重新统一,则台湾的局面肯定是另一番图景。

